

人类学民族学硕士研究生 培养经验五人谈

周大鸣,彭兆荣,林敏霞,等

[摘要] 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硕士研究生教育已从精英教育转换为普及教育、素质教育。适应这种变化,人类学民族学硕士研究的工作应该强化。在增加数量的同时,不降低质量。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厦门大学人类学系、广西民族学院等单位的做法值得借鉴。

[关键词] 人类学民族学;硕士研究生;培养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887(2006)01-0051-07

A Group Discussion about the Education of Master Graduates Majoring in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 ZHOU Da-ming, PENG G Zhao-rong, LIN Min-xia

Abstract: Since the middle 1990s, postgraduate education has shifted from elite education to general education and quality education. Accordingly, education of the master students should be intensified, i. e. when their quantity is on the increase, their quality should not be under-emphasized. The practices of the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the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of Xiamen University and Guangxi University are worthy of reference.

Key Words: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 master graduates; education

徐

杰舜:人类学的发展很需要后继力量、新生力量不断涌现,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人都提出了这个问题。所以在本次论坛中,我们就专门对人类学民族学硕士研究生培养问题作一个探讨,下面主要发言的三位教授,周大鸣教授是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主任,他们那里培养硕士研究生的历史是相当长的,培养博士研究生也是很长了。所以,我们有时候说周大鸣教授是我们中国的博厄斯,硕士、博士培养了很多。第二位要发言的是彭兆荣教授,他是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人类学民族学系主任,他也是经验丰富,他会介绍一些硕士研究生培养的经验,厦门大学培养硕士生的历史也是相当悠久。第三位是中南民族大学的段超教授,在这里我首先要对他表示衷心的感谢,因为他最

近一直在辛勤的穿梭飞行,他昨天去北京晚上赶回来,好厉害啊!昨天上午飞去,晚上坐火车今天早上到,然后到我们这里开会,为我们中南民族大学申博真是费了心血,据说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结果。段超教授对我们中南民族大学研究生工作是做了很多事情,那么今天就请段超教授讲讲中南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情况。另外是两位同学,一位是中南民族大学的梁正海,他现在是研二,是柏贵喜教授的学生,他现在想提前毕业,那就看看他有什么“招数”要告诉大家。最后一位是广西民族学院的林敏霞,她是研三。今天下午为了抓紧时间,每一位教授发言是十分钟,每一位同学发言是五分钟,可能有点不“平等”,但这没有办法,你们就把要讲的话做个即席发言。下面请周大鸣教授发言。

周大鸣:徐老师出的这个题目,我自己想了一下。其实

* 发言顺序为周大鸣、彭兆荣、段超、梁正海、林敏霞,会议由徐杰舜主持。本文主要由徐杰舜、林敏霞等整理,未经其他发言者审阅,特此说明。

人类学
·
乡土中国

周大鸣
彭兆荣
林敏霞
等 / 人类学民族学硕士研究生培养经验五人谈

51

GXM YXB

我自己也当过学生、当过研究生,也带过研究生,实际上像中山大学和其他学校研究生管理的方式应该是大同小异的,制度上就是按照国务院的研究生管理条例。另外,我们自己也定了一个制度,就是“研究生培养手册”。这个“研究生培养手册”是每个学生一本,每个导师也一本,这个手册讲了各种各样的包括学籍的管理、学位的申请、成绩的考核、处罚条例、请假条例等全有,这些就不需要再讲了。

我们系的硕士研究生培养其实有一个转化,早期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80年代初期、70年代末期开始招硕士研究生,那个时候是精英教育,把硕士研究生教授看成是精英教育,采取的主要方式是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以前我们招的研究生非常少,大概一个老师招一个,招两个就算多了。基本上是师傅带徒弟的方式,这时候研究生的课就是导师上,就有点像家庭式的方式,我们叫做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实际上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开始,我们国内研究生招生数量大规模增加,硕士生增长很快,像现在我们学校每一年招收硕士是四千多人,我们系在80年代是每一年招两三个,现在每一年硕士生招二十几个,博士生10来个,这时的规模和过去相比是增大了。我觉得实际上从90年代中期开始,整个国家把硕士就没有再作为一种精英教育,实际上已经把它作为一种普及教育、素质教育,我们说这样是为了延缓就业、延缓就业危机。所以在这种转化过程里面,因为研究生的数量增加了,那么怎么样在增加数量的同时不降低质量,就是摆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难题。所以,当时我们就是资源共享,再不允许导师给自己的研究生单独开课,我们要求所有的课程都必须open,就是都必须公开的。我们每个学期都要做的就是在上个学期结束的时候,每个老师把自己要开的课拿出来,请学生们自己填名字、选课程,如果达不到一定的人数就不开,我们规定人数要到三个以上。这是因为过去没有管理改革的时候,一个老师说给自己学生上了多少课,你是没有办法考证的,有些就是在自己家里上课,这样也不方便管理,所以我们后来就说由我们全部统计落实,这样我们就是淡化了导师的决策,这是我们的一个措施,就是资源共享。

另外,一个就是原著导读,我们专门强调原著导读,开了这门课,要求每个硕士生要读100本,博士生读200本书。当然,这个对于不同的专业、方向,我们会开不同的书,这是书目的问题。另外,就是学生自己有沙龙、有田野调查报告会、有读书会,所以这样学生就蛮活跃的,他们自己也请一些老师给他们讲,老师是自愿参加,学生也是自愿参加,其实这种是很好的。就像有些同学做完田野调查回来,带来很多问题,自己又想不通,其他的同学一讲再加上一些老师一讲,他可能就提炼出很好的东西来;再有的同学想选论文题目,他也提出来题目和可行性等,同学们也可以讨论。我觉得这样的沙龙实质上就是老师和同学互动的场所,因为比较自由,大家就都可以参加。

第二个,我想就是加强和学校的其他院系的合作,让学生去选其他一些院系的课,这样就打破原来那种的分割,这

也是我们目前做的第一个。

第三个,就是严格管理,像刚才所说的,一个是课程的开设,每个老师要开设的课程,你要开这个方向,我们就要求你必须开设这个方向的课。我们很多老师都喜欢在招生广告上开很多新方向,但是他没有开出课,我们就不批准。我说你先要把书目和教学大纲拿出来,我就同意你开新的方向,要不然的话就不行。就是严格从老师这方面先把关,要想开新方向必须把这个方向的课程和书目都开出来。

第四个,就是导师开课,我们规定必须要上够多少课时,过去我们有些老师一学期上课三四个小时就完了,这是很普遍的现象,现在是不许这样的。就是一定要上够多少学时的课,比如说我们人类学,20个星期你就至少要上够15个星期的课,不能给学生“放羊”。

第五个,就是严格考核制度,我们中山大学在这一点上是很严格的。凡是作弊抄袭的,我们就开除学籍,没有商量的余地,这是非常严格的,在这一点上还要加强。

再有一个转折,就是我们过去是三年制,从前年开始我们改成两年制,这样对我们的学科来讲就非常的严峻,我们现在就是一年之内把所有课都学完,然后假期就去做田野调查,回来就做开题报告,然后再回到田野去做调查,写毕业论文,然后就完了。现在就是这样培养的。所以,现在两年制就是第一年把所有的课做完,然后第一年的学期末就要把论文的题目定下来,然后利用暑假为选题去做田野调查,然后9月底就做开题报告、中期考核。所以,我们现在一个是选题,就是刚才讲了,比较自由开放的,老师学生都参加,自己自报你的选题,大家觉得可以了就做田野调查。

我们开题部分是比较严格的,你开题要是没过,就必须重新开,我们就想把工作做在前面,要不然到了毕业的时候不过的话就很惨,学位也拿不到、毕业证也拿不到。在开题的时候,我定的规矩就是表扬的话免谈,专门提批评、提意见,帮助学生把开题报告做好。开完题以后就是导师和学生的互动,就是说发现学生在田野过程中的问题、在主要的流程里面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们论文评审也是要求一定要有系外的评审,不能只是系内的评审,还有我们的答辩委员会也是要求一定要有系外的教授来评审、组成答辩委员会。我们的论文评审是一票否决制,比如说我们三个人评议,只要一个不同意,就不进入答辩程序,就是一票否决。如果答辩委员会一票否决,我们就建议他修改再来,实际上就是一票否决了,当然我们一般都会再给他们一次答辩的机会,这就是我们的研究生的培养。所以,这几年是三年制的、两年制的都有,现在基本上研究生就业是百分之百,还算是可以的,我们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

彭兆荣:其实刚才大鸣教授已经把大概的情况都介绍了一下,那么制度内的东西都是一样的,比如说现在教育部基本上有一个原则,就是向西方的大学学习,在博士上有数量上和质量上的严格的把握和要求,一直以来博士的增长是零增长,那么相反硕士就相对扩大了,从原来的精英的教育,慢慢地变得不是这么精英的,在硕士方面有点向西方看

齐,因为在西方大学里面硕士教育没有任何严格的,比如说在法国,法国都没有硕士教育,它没有这个概念,就是一个“DAR”,就是大学本科毕业以后进入了博士的预备阶段,是一年叫“DAR”,一年之后就上完课了。在国内,因为法国是发达国家,所以就把那个DAR当成是Master,像在法国是找不到硕士这个文凭的。像我们厦门大学也差不多是这样的一条路,我们没有中山大学走得那么快,我们现在在硕士上也是做了两年的规划,但是还没有真正的实行,现在还是三年,是希望有个过程。我们的博士是以四年来规划,先是试验阶段然后就进入这样一个过程,也就是说硕士时间上会比较短一些,这样困难也就跟着来了。至于说厦大在硕士培养上如果有什么招生以及教育上有什么特点的话,那么我们的石奕龙教授也在这里,他也做了很长很长的工作,如果哪位同学想更详细的了解,可以私下里向石教授去了解。

厦大的硕士实际上是“量”问题,因为我们原来是一个研究所,它还不是完全按照系的教学单位来实施,所以我们有我们的特点,也就是说硕士进来以后除了规章制度,加上厦门大学学生处的要求以外,我们基本上会比较开“小灶”。当然我们这个研究所主要就是配合,是研究生跟导师来学习。我们的特点是招进来的硕士第一年是没有导师的,有一个想法就是让所有的导师给所有的学生上课,如果第一年学生一开始就跟一个老师,然后造成老师之间、学生之间有些担心,就可能会产生是在你的名下招进来的,其他的课就不怎么敢去上这样的现象,所以我们这样就等于第一年没有导师,没有名,名下的导师全部都是你的导师,所有的课全部都要上,不要求第一年有一个老师。因为我们中国的情况是很特别的,我们有人类学本科的很少,所以有些硕士是外学科进来的,所以我们必须在第一年给他恶补,强化他们去读很多的书,开很多的课目,比如说石奕龙教授开始就给他们开很细很细的教材,开给他们,从最根本的科目开始,然后所有导师的课都要求你尽可能的听,你读过也好,没有读过也好,我们是希望在第一年的时间内让学生在人类学上有一个很大的补习的过程,具体的做法,归纳一下有几个。我是非常强调读经典的东西,学生说要读什么书啊?我就说你去把经典的民族志能找来的就都去找来,就我本人来说我会根据我的研究,会给他们印一些国内没有的外文资料,强迫他们去读。我们现在国内的人类学的资源也很多。我就帮同学准备一些,你要是让学生去找的话他们也找不到,然后就复印一本给他们让他们去强读,然后让他们把所有可以找到的翻译过来的经典民族志都交上来,所以第一年要他们所有导师的课都要上,所有能找到的经典民族志都要读。到了第二年,就是第二年的第一个学期我们才开始选导师,这个基本上也是一个双向的,因为学生已经是经过一年的修炼学习了,然后根据自己导师的情况、自己的研究方向、兴趣、自己根据自己的未来的前途等等,加上发展的可能性、自己跟导师取得沟通。这样第二年结束以后就开题、选导师,然后经过导师的启发和沟通、互

动选择一个题目做开题报告,再通过以后去田野,田野回来修改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完成论文,大概的程序是这样的。

当然,在具体的要求上,我本人在新生入学的时候我会跟他们做一次交流,我大概是这样跟他说,我还记得大概是三句话:我说你们在这里作为人类学的学生,我要求你们做到第一个:为人;第二个:读书;第三个:立事。所谓为人,不是说叫你去怎么样,因为人类学,就是说你们毕业以后将是一个人类学家或者说人类学者,你们基本的是要做田野,做田野就是跟人打交道,如果你们有些为人的方式、为人的个性等等没有做一个准备的话,以后做田野要在最短的时候里面获得你的调查对象的认可,你要沉的进去,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如果你不学会与人打交道,不学会真诚的待人,你要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得你要的东西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告诉他们,读人类学的研究生首先你要做一个合格的民族志田野工作者的基本的为人的一个素质要求,就是要跟人打交道。因为有些同学以前就很封闭,又不敢讲,话又不多,那你怎么去做田野,所以这些会去教他。然后读书,刚才我讲了,要大量读,读原著,读民族志。

立事,我主要去从田野调查当中给他们介绍,怎么去经历这样那样的东西。因为在田野的过程中,硕士研究生要求田野的时间不是很长,你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可以拿出录音机,什么情况下可以拍照,对什么人说什么问题,在什么情况下等等,我们都会做一个参考的案例,我自己会给他们做这个。因为我们不是记者,我们也不是采风者,我们不能学记者一下去录音机就拿上去,这样是非常不尊重人家的,你能够收到真实的东西吗?人家看了就怕了。所以,事实上人类学做田野调查这些非常细的东西,非常关键性的东西都是很有讲究的,所以像这些立事的技巧也会作为一个内容告诉他们。

大概我还会强调一点,就是作为研究生你是一个研究人员,一定要强调你的理论的色彩,你下去以后不是写一个随感、观感的东西,那么你怎么体现你这一篇是研究论文,你就是要体现你的研究色彩。你的色彩除了你在训练当中形成一套比如说你的逻辑思维能力,你要大量去读理论的书。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女生越来越多,现在在美国的伯克利也是这样,女生越来越多,那么特别要求女生去加重理论色彩。怎么读?理论里面大约有很多条路,比如说你要先普遍去阅读,在一年级的时候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理论,就是所有导师的课你都要去听,当你选择一种理论,要进入你的田野分析点的时候,我是要求你要做一份基本的谱系梳理,这个理论人家做到什么样了。你要大概的搜罗来,你要做一个文章综述,在前任线索的基础上你来综述、分析、评论,才能创新、批判等等。如果这点做不到的话,你就没有研究的特点,所以我就要求理论谱系的梳理,当然对于硕士研究生,我的要求不是非常严格,但是比如说你要做仪式研究,讲到几个西方的比如说“Van Gennep”、“Turner”、“Geertz”等,这些比较有名的,你要大概了解,你哪怕不知道原著,但你要大概知道它讲的是什么,否则你做

了半天,人家是很早就已经做过了的,你做它干什么?所以,我会很强调这一点,我也看了很多外校的博士论文、硕士论文,好像这一点是中国蛮普遍的一个毛病,台湾在这一点上是比较强调的,我也很强调这一点。

当然,就是我会讲一下我个人的学习方法,怎么来学习。特别现在年轻人读书,也读了很多书都是浪费掉了,读了很多书可是你不知道把你读的书用到自己的论文当中去,这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你要学会不浪费。在最年轻的时候,精力最好的时候,你要教他们怎么把对你有用的东西、你读到的东西最后变成你自己的东西,然后化到你的论文中间去,这个我会教他各种各样的可以借鉴、可以参考,他们可以接受的方法,让他们按着这个方法去做。我想我要讲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徐杰舜:两位教授时间都掌握的非常好,下面把时间交给段教授。

段超:前面两位教授都把各自学校的培养研究生的做法做了一个介绍,那我就把中南民族大学研究生的教育向大家报告一下。我们中南民族大学在培养民族学研究生上的一些做法,我想讲三个问题,第一个是研究生在招生过程中,就是我们的生源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学校的特点,和两位教授的学校有区别的。目前我们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研究生的来源上,和以前相比有很大的改进,是一个方面,但是另一个方面还面临着生源不足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全国都有这样的问题,因为我做研究生工作知道这个问题,很多学校的生源不是很好,连湖北省调剂来的都是比较多。我们现在的民族学这两年在自己的努力下有了很大的改进,每年都完成了自己的招生计划,但是前几年这个问题还是比较严峻的。目前,我们有这几个问题,就是在生源的质量上有很大的问题,一方面就是报民族学的学生本科期间就学习民族学的人是比较少的,我说这个包括我们的大民族学的,包括民族理论、民族史、民族经济。实质上除了民族经济以外,都存在这个问题,就是按照我们的一级学科下来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对于今后我们国家民族学人才的培养和质量的提高是有很重要的影响的。现在我们民族学的本科生要减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与本科生的就业率有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像彭教授说的,是国家的人类学方面本科生教育的人数少,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要研究怎么样提高研究生培养的质量问题,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现实,留在了我们在培养阶段解决它。当然现在我们的很多导师对这个问题都很有看法,所以这是我们国内中等城市、重点大学以外的学校的一个普遍性的现象,包括还有历史学都面临着这个问题,这是我给大家介绍的,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就是培养的环节,研究生的培养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环节。目前我们跟重点大学的做法大体是一致的,只是有些具体方面还要进一步的规范,在课程体系方面,我们主要是三个层次,一个是公共的专业基础课、专业课、方向课,方向课是在最后的导师这里体现出来。第一个

层面的专业基础课我们是想把它打通,同一个一级学科下打通它,掌握和学科有关的最基本的、最广博的知识,这一点我们还要进一步做这个工作,我们中南民族大学准备在明年开一个全校的研究生教育工作会议。这些也是我们的一些特点决定的。到目前我们中南民族大学还没有开一次全校的关于研究生教育的会议,这次我们学校党委开会讨论准备总结我们研究生教育二十多年的经验,来明确一下目前的形势和今后的任务,这个方面就是想在下学期把培养环节经过调研以后来落实、规范它,现在就是在课程体系上我们基本上建立了比较完整的课程体系,其他有关的比如说怎么发展学生的能力、个性方面这样的课程设置要得到进一步的保障,这是我们正在做的一件事,这就是我们中南民族大学在研究生培养方面做的一些事情。从民族学来看,我们这方面也进行了很好的探索,但是还有一些问题,经过大家的努力我们民族学一级学科的硕士点已经申请下来,博士授权点也很有希望,特别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通过教学的改革来促进培养质量,我们想通过一些研讨来解决这个问题。

第三个就是研究生的出路,就是学生毕业的问题。现在本科生的招生是根据它的就业情况来决定的,现在和原来的体制不一样,你就业情况怎么样招生情况就怎么样,国家现在已经是这种变化了。就业是现在大学教育的一把手工程,校长、书记都在抓就业,这是国家教育部规定的。就业作为教学评估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学校办得好不好,其中一个指标就是看就业率高低,对于本科生教育是这样的。对于民族学的研究生教育来说,我觉得就业还是很重要。现在的学生很现实,选择什么专业、读什么研究生和他毕业以后的就业、去向是紧密相连的,如果就业去向不能很好地得到解决的话就会影响它。从我们民族学专业来看,我们目前的就业率是百分之百。但是这个问题并不乐观,我想过三五年以后这个问题就比较突出了。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作为研究生的主管部门也在进行调研,在这个学科的今后去向到底怎么做。这么多硕士点相对来说,很明显报我们民族学的人偏少,很多学生就是考虑毕业以后很难找单位。这个问题是社会的需求和我们研究生的培养怎么相结合起来的问题,这是影响我们民族学学科发展的,从后备人才上我觉得是有影响的。因为我们研究生教育有很多目的,为社会服务,为民族学的发展,民族学的发展后来的人要接上,这些人要是生计问题都解决不了的话,我觉得对这个学科应该是很影响的。民族学在我们国家,在文科中是它应该是属于小的学科,从培养的人数上来看是个小学科。那么我们要发展的话,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多的。现在一个问题就是像我们民族地区,应该是民族学施展才能的地方,但现在有几个问题。一方面就是民族地区都比较贫穷,我们的学生们期望值都比较高,都不愿意回去工作。民族地区考来的学生都是为了摆脱到民族地区才考来的,这种人占了90%以上。这样就是对他的培养能够奠定基础,能够有用武之地的地方他又不愿意回去,当然客观上

因为这些地方都比较贫穷,现在国家从制度制定了优惠政策,比如说一些人才引进战略等等,但这些东西如果跟不上的话,民族学学生的就业面就受影响,特别是要为现在服务发挥作用,民族学同学我觉得应该在民族地区更能发挥作用。按照国家人才培养的要求来说应该是个重要的方面,为民族地区服务,不然的话,民族学都去搞研究、读博士,博士毕业以后都留在大学里面工作,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就是我们教授们说的,现在研究生教育正是一个转化,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化,目前正在这种转换之间,但是如果没介入一种基础教育和素质教育的话,为社会服务就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它?我想我们民族学的研究生都有这样的困惑。现在经过时间的推移,这个问题今后可能会表现出来。所以我就是谈了一些感受,研究生教育特别是民族学研究生教育的问题,就是我们在研究生教育上要解决的三个问题。

上述第二个问题的解决就主要是我们培养单位经过一些论证,通过一些学校先进单位的经验在培养方面要做得合格。第一个和第三个问题牵扯的问题比较多,我也没有想出什么更好的办法建议,只是提出这个问题,怎么把这两个问题解决好?有利于民族学硕士研究生的发展,有利于我们民族学的人才培养,有利于民族学这个学科的持续发展。

徐杰舜:下面梁正海同学发言。

梁正海:我是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专业的二年级研究生梁正海。再次感谢徐杰舜教授和组委会给我提供这次机会,我给大家报告的题目是“注重三个互动 培养三种能力”。作为一名合格的民族学研究生,应该初步具备运用学科思维独立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研究问题的能力。培养这三种能力,我们认为应该注重师生三个方面的互动,即在专业基础理论教学中的师生互动,在田野工作中的师生互动,在科研过程中的师生互动。下面我就谈谈自己和同学们的一点感受,请各位专家、学者指正。

一是注重专业基础理论教学中的师生互动,培养学生独立的学科思辨能力。学科思维的训练,离不开老师的辛勤耕耘和学生的刻苦学习。研究生学习与本科不同,一方面,老师授课节奏快,涉及面广;另一方面,许多同学的思维方式和学习习惯还停留在本科阶段,在学习中感觉无从下手。针对这种情况,我们的老师通常给我们分阶段开列阅读书目,传授读书的方法。这样不仅避免了同学们读书的盲目性,做到有的放矢,提高读书效率,而且培养了同学们独立学习和思考的习惯。在授课的时候,老师们还经常用自己治学的经验引导同学们了解、学习、研究、比较已有的理论,鼓励我们要善于学习前人,又要敢于质疑、提出问题,启发我们用学科理论对问题进行思考、分析,并组织我们展开充分的讨论和交流。同学们都觉得这种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互动学习方式,对培养同学们独立的学科思辨能力起到了很大作用。

二是注重田野工作中的师生互动,培养学生运用民族

学学科思维观察事物、发现问题的能力。民族学研究的最大特点之一在于它不是纯粹的“书斋”学问,而是在“田野”中建构的人文学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田野调查成了民族学最基础、最重要的方法,是民族学学科的生命之源,也是民族学研究生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有效途径。从泰勒、摩尔根、马林诺夫斯基、米德、特纳、列维-斯特劳斯等人类学大师到今天的民族学学者有影响的著作都是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整理、提炼出来的。我们中南民族大学在培养学生田野调查能力上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第一是在课程设置上安排了“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培养同学们的理性认识;第二是老师在上课的时候,播放田野调查录像片,增强同学们的感性认识;第三是在社会实践调查课题中,给学生提供了一定的科研经费,等等。问题是我们民族学的大部分学生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学、人类学田野工作经历,他们在进入社区调查的过程中又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而常常缺乏老师的现场指导,感到抓不住要点;在撰写调查报告的时候,才发现许多方面被忽略了。这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了调查报告的质量。因此,同学们都希望能将田野调查理论课程的教学与对某一具体问题的田野调查有机的结合起来,在老师的具体指导下,深入学习并切实掌握田野调查的理论和方法,不断培养和提升自己运用学科思维观察事物、发现问题的能力。

三是注重科研过程中的师生互动,培养学生运用学科思维独立地研究问题的能力。我们中南民族大学为了培养学生独立的科研能力,设立了“大学生创业科研基金”和暑期社会实践调查课题;还举办了“研究生学术论坛”,为同学们提供了学术研究和交流的平台。同时,还经常邀请知名的民族学专家、学者到学校作专题学术讲座,多次承办了人类学研讨会。通过与知名专家、学者们的零距离接触,聆听他们的教诲,同学们开阔了视野,激发了科研兴趣。这对提高同学们独立科研的能力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总的来说,在科研过程中,师生互动仍然显得不足,一方面是学生参与课题研究的机会不多,另一方面是老师的教学、科研任务比较重,缺乏足够的时间指导学生的科研工作。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同学们科研能力的培养和提高。作为民族学专业的研究生,我们热爱民族学,我们将努力学习,力争使自己成长为一名合格的民族学工作者,为民族学事业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徐杰舜:好,下面请林敏霞同学发言。

林敏霞:我想今天非常荣幸和各位学界前辈交流这个问题。刚才我们几位教授从制度层面,从教师本身的角度去谈这个问题,这位二年级的研究生跟我一样的,我也是三年级的研究生,广西民族学院的研究生,可能我想我谈的也是从我们学生自身的角度去谈这个问题。我的角度主要就是自己的感受,就是说从自己学校说的。因为每个学校的经验、条件不一样,所以它在培养研究生的时候可能都会有自己的特色。我所谈的就是一个本土的、个人的经验,是近三年来和我的导师以及我的同学们相互交流学习中得出的

一些体会。

第一年刚来广西民族学院的时候,我们的导师就说要给我们提出一个目标和基本任务:就是挖好一口“井”,做到五个“一”。所谓挖好一口“井”,就是要研究生在研究生学习期间,确定他自己的学术方向。三年的时间很宝贵,尽快根据学生的特征和兴趣帮助他确定好自己的研究方向是事半功倍的。像我的同学中有一位本科时候就是学泰语专业的,根据这个特点,我们导师就安排她做有关中泰文化比较方面的课题。我自己来自浙江,广西对我而言本身就是很好的一个天然的田野点,所以,广西的平话人是我的研究方向。在此基础上,我们导师就要求我们在研究生阶段做到五个一:第一,要做好一个索引,要了解自己这个研究方向上前人已经做过的成果;第二,要写好一篇相关的述评,了解前沿在哪里,突破口在哪里;第三,做出一个完整的民族志,这是我们学习人类学民族学的学生最基本的一个能力;第四,要写一篇经典著作的书评,针对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经典著作要写一篇比较全面的、比较到位的、有分量的书评;第五,要写一篇规范的学位论文。这“一口井,五个一”当时看来好像很遥远也不知道能不能完成的要求,如今已经是两年多过去了,现在回过头来看,除了我们的学位论文还在完成当中,前面四项我们基本上都做到了。这个和我们导师一开始就提出目标,并在整个过程中始终严格要求,从不松懈是紧密相关的。

为了使我们能完成上述提出的目标,导师在平时的学习中一直要求我们要“多下田野、多读书、多写作、多讨论、多参与”,做到“五多”。第一个多,就是要多下田野。作为民族学人类学的学生,学会如何做田野,如何在田野中“生存”获取资料,是最基本的能力和素质。我们导师对于我们这方面的要求,几乎是“米德”式的。他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像玛格丽特·米德一样能在单枪匹马在一个异域的田野中应付所有的问题。从考上他的研究生,拿到通知书的那一天开始,他的学生就会一个个被分配调查任务,拿着调查提纲到一个个他指定的地方去做田野调查。连我这个当时还在上海工作的学生也没能逃脱,被安排在浙江的家乡做了一次有关渔民转业转产的调查。正式进门后,我们的田野调查更是没有停过,每个寒暑假我们基本上都在田野中渡过,甚至连我唯一一次在“五一”的时候回家参加我弟弟的婚礼的时间里,也被安排了调查任务,就是把我原来做的有关渔民转业转业的调查能再深入点,做出一个完整的个案来。坦白地讲,面对这种“米德”式的要求,心里并不是没有怨过,不过,一旦我们有这种情绪,徐老师就会说,“这都是为你们好,要不然,你就别读我的研究生”,那除了继续乖乖地去做田野,我们还能做什么呢?如今回过头来看,我们几个同学,在自己的田野中还真能独当一面,从自身的生存、到关系的建立和资料的获取,基本上都能应付自如。第二个多,是要多读书。除了会做田野,通过阅读来把握人类学的学科面貌以及当前的潮流,建立理论知识,培养理论的抽象能力,对于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研究生来讲也是

至关重要的。徐老师要求我们在不超过两年的时间里面读完100本人类学的必读书目,其中10本是精读,并且要写出相关的读书笔记。这些大量的阅读的训练,一方面培养了作为人类学研究生的基本素养,同时反过来对于我们田野的启发也很重要。当时在进行阅读训练的过程中,每个星期,每个同学读了什么书,我们都要负责登记下来的,并进行简单的汇报。因为大家一起读,又有这么一种诚信制约的制度(我们都相信大家有一个基本的诚信准则,要不然,没有读过的书,说自己读过了,好丢脸的),所以,当时我们集中精力阅读了主要的中外人类学的经典。如今,作为一个后继的工作,我们的一位姓何的同学正在帮助徐老师负责组织我们撰写“人类学经典导读”一书的工作。如果没有一定量的前期阅读训练,这个工作开展是难以想象的。第三个多,就是要多写作。可以这么说,我们研究生的学习成果,最后都要体现在文字上。所以,我们所进行的所有的田野调查都必须写调查报告,同时写田野日记。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浙江渔民转业转产调查小小的例子来说,我自己一开始去做,从来没有想到要把它形成文字,只是认为那是入学前一次小小的非正式的人类学田野的训练,然而,时隔一年后,我们徐老师还记住我曾经做过这么一次小的调查,在我五一回家参加我弟弟的婚礼的时间里要求我去继续做调查,并写出文章,参加上一届的生态人类学的会议论坛。虽然就文章本身而言,不算是什么出色的文章,但是我的体验真的很深。因为每一次写作,都迫使你思考,而每一次的思考,就是对于自己已有的知识的进行一种重新审视、批判和组合。而且,我们导师认为,多写作,可以积累成果,可以看出自己的成长,而且也有利于激励自己不断地去多读书,多思考。这个是研究生区别于本科生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第四个多,就是要多讨论。讨论是面对面的交流,可以直接针锋相对地进行不同意见的交锋,这个有些时候比写作还要考验我们的胆量。不仅在课堂教学上采用主题讨论的方法,而且有机会我们会把讨论延伸到课堂外面。徐老师特别鼓励学生提出不同意见,如果能驳倒到他的观点,他就乐呵呵地给高分。其中有一件事情印象特别深:我们刚刚入学的时候,徐老师曾经组织了一次题为“什么是人类学眼光”的讨论课。当时大家众说纷纭,甚至关于“眼光”内涵的界定都争论不休,对于徐老师提出的“人类学的眼光就是从人出发再回到人”的观点显然也有了不同的意见。最后,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参加了2003年10月份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举办的“民族学人类学与中国经验论坛”,利用论坛空闲时间就这个问题对其他的人类学学者进行采访,吸取不同的意见和看法,重新组织自己的观点,最后形成一组文章,这组文章显然各自有自己的见解和风格,显然并不不同于我们导师的意见,但恰恰也是我们导师最喜欢的意见。我想补充说的是,当时在会场上大概再也没有其他的学生会像我们几个一样,为了访问到数个不同的人类学者的意见,会在论坛休息的时间里,那么活跃、那么拼命争取时间去一个接一个地访问我们根本不认识的学者。以至于后来

有台湾的学者说:在大陆看到几个学生众星捧月般地围绕着学界前辈,不断地虚心求教,很受感动和鼓舞。就因为这份感动,他回到台湾后特地从台湾寄了他的新作《羌在汉藏之间》到广西来,给我们几个学生轮流阅读。通过各种形式的讨论,我们培养的不仅仅是一种思考的能力,也练就一种勇于追求不同思想的品质以及提出不同意见的胆量。第五个多,就是要多参与。在我们导师的观念中,研究生除了自己学习,还应该尽量合理地参加各种和学习有关的工作中,通过参与各项工作,把自己学习到的知识运用进去,同时也从中检验到自己不足的地方,及时改进。对于这个“多参与”“我个人的感受非常的深刻,从某个角度而言,多多参与也是我们导师带研究生最大的特征之一,通过多参与,各种综合能力得到大大的提高,甚至无形中也为我们在研究生阶段奠定了一些微薄的学术成果。这些参与形形色色,在这里我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第一个最基本的参与,就是参与本科生人类学教学工作,一个人讲一章或者两章的内容,就反过来要求大家对于这块知识要掌握地十分细致,而且能深入浅出地讲解出来;第二个参与是参与人类学教程这个教材的修改工作,这本教材现在已经出版,对于我们来讲,即提高能力,也是一点小小的学术上的成果收获;第三个参与就是尽可能参加各种学术会议,扩大我们的视野,能认识更多的人类学学者,从他们身上学习东西。就我个人而言,读研究生以来,连这次会议算在里面,我参加过5次人类学方面的会议,和那些没能有机会参加会议的同学比较,自己确实感觉收获不少。特别是坐在这些老师中间,听他们讨论交流,更是能收获到平时课堂里面无法得到的许多知识。比如,近距离地听周大鸣、王铭铭、彭兆荣、王明珂、翁玲玲等等学者的学术生涯和思想观点,对于自己的启迪真的非同小可,包括理论上的一些反思,有些反思后来还直接体现在自己发表的文章上。第四是参与学术著作的编撰。我们每个人手头都有一本书的编撰工作,有的已经完成初稿:如《平话人变迁》、《平话人图像》、《平话人印象》,有的正在进行中,像《登民》、经典导读等,可以说我们的训练不仅仅在于写一篇文章,也扩展到了一本书的编撰。其他的参与还包括学者访谈的录音、会议录音的整理、专业文章的翻译等等,这里因为时间的关系就不一一细述了。

总之,通过目标的设定、通过具体方法上的实施贯彻,两年多来,我们在动手能力、沟通能力、参与能力、语言能力、观察能力、理论提炼和升华能力、应用能力、创新能力上都有比较大的进步。而我最后想说的是,所有这些能力的

获得和提高,与我们导师的负责态度、严格要求、悉心培养和爱护是分不开的。一个导师只有具备了一颗对自己学生负责任的心,他才会时时刻刻把自己的学生放在心里,才会不断地寻求和创造各种机会给自己的学生去学习和施展;一个导师只有具有了从严要求的精神,才能不断鞭策自己的学生在宝贵的青春年华中尽可能多地吸收更多的养分,不在无谓的事情上浪费光阴;一个导师只有具备了悉心培养的耐心和爱心,才能及时给予在前进途中受到挫折、陷入困惑的年轻学子以勇气和鼓励,朝着前方不断前进。

最后,回到本次发言的开始部分,我说了我所讲的是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生培养“本土”的一点经验。是否值得大家借鉴,需要和各自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看待。但是,“本土的”、“个人的”经验的东西,并不拒斥经典的人类学民族学的培养模式;而经典的人类学民族学硕士的培养方式根据不同的情况也可以吸收其他“本土的”、“个人的”经验。无论如何,我们最终的目的都是要培养有良好素质和综合学术能力的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生。我的发言完毕,谢谢大家!

徐杰舜:谢谢各位发言的代表,由于时间的关系,现在我们基本上完成了这次论坛的全部议程。在中南民族大学以及中南民族大学民社院、中南民族大学南方研究中心的鼎力支持下,此次论坛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另外,我相信关于研究生教育的问题,我们在座的各位代表,特别是当硕士导师的都有很多看法、经验,包括我们台湾的朋友,他们也有很多看法、经验,时间的关系,我真的是很想把它开放出来讨论,但是一开放6点钟就到不了家了,这就比较麻烦,所以我们还是按时回去,因为今晚是闭幕式宴会,那我们就在车上继续讨论。谢谢大家,现在散会。

收稿日期 2005 - 11 - 23

[责任编辑 黄世杰]

[责任校对 何 荷]

[作者简介] 周大鸣(1958~),男,湖南湘潭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中国族群研究中心主任。广州,邮编:510275;彭兆荣(1956~),男,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厦门,邮编:361005;林敏霞(1978~),女,浙江台州人,广西民族学院人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广西南宁,邮编:530006。